

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

儒学传播与 汉晋南朝文化变迁

夏增民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
文科学术丛书

儒学传播与 汉晋南朝文化变迁



夏增民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学传播与汉晋南朝文化变迁/夏增民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

ISBN 978-7-5609-5285-7

I. 儒… II. 夏… III. ①儒家-文化史-研究-中国-汉代
②儒家-文化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朝代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9572 号

儒学传播与汉晋南朝文化变迁

夏增民 著

责任编辑:刘 亭
责任校对:汪世红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监印:熊庆玉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3.125 插页:2 字数:300 000

版次:2009年7月第1版 印次: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24.00元

ISBN 978-7-5609-5285-7/B·59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全面提高,在提高中发展

刘献君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华中理工大学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进取精神,率先在全国理工科大学中开办文科,文科建设开始起步。1994 年初,以文学院(除经济学以外的所有文科)、经济学院(从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分离出来)的成立为标志,我校文科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经过文科师生的共同努力,文科建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至 2007 年 8 月,我校文科已拥有 2 个国家重点学科、6 个博士后流动站、4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3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73 个硕士点、26 个本科专业。

近 30 年的努力,我校文科建设取得了一些经验,其基本经验是:遵循“加强基础,面向社会,交叉见长,特色取胜”的发展方针,从高起点研究入手,尽快进入学科前沿,并依托学校工科、医科的强大优势,走学科交叉之路,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文科。具体表现在:新闻与新闻传播学院在全国首创了“网络新闻传播”专业,在新闻传播界树立了良好的文理交叉型教学与研究品牌;教育科学研究院强化研究特色,造就学科品牌,其“院校研究”异军突起,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哲学系打造学科亮点,依靠特色取胜,在社

会认识论、生存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生命伦理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济学院在张培刚和林少宫两位大师级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下,在发展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2006年获得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文系在科学研究方面体现出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点,其汉语言文学学科稳步发展,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科研课题20余项,其中包括2004年首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信息处理和计算机辅助汉语史研究”;社会学系高度关注社会发展,其移民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在全国独树一帜;法学院则以科技法和经济法研究为突破口,立志创办全国一流的法学院;管理学院沿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目标,调整学科结构,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开展科学研究,连续3年的年科研经费超过1000万元;公共管理学院依托学校理工科优势,把握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致力于信息技术在公共领域的运用,以“数字城市政府管理”作为自己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特色,取得了初步成效。

我校文科建设经过起步、发展,现在已经进入了提高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提高,在提高中发展”。

“全面提高,在提高中发展”,就是要在已经实现“重点突破”的基础上,努力克服学科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力加强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实现学科的均衡发展。

“全面提高,在提高中发展”,就是要有针对性地引进国内外知名学者,产生出更多的大师级学者,大力培养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各个学科形成一个高水平的教授群体。

“全面提高,在提高中发展”,就是要继续大力开展学术研究,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建设。基础学科的加强,是其他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要面向社会,大力开展应用研究,积极主动地去争取承担国家重大课题,从而通过我们的研究,为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的决策提供依据,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为创建和谐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为了提高学术水平,推进文科建设,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1995年开始,我们出版了《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2000年以后,改为《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多部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先后问世。《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的出版,在提高教师学术水平、推动学科建设、扩大我校文科学术影响、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等方面,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学校已确定“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目标和“育人为本,创新是魂,责任以行”的办学理念,因此,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文科的建设和发展。我们的文科教师要共同努力,产生更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提高文科学术研究的水平,进一步促进文科“全面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进程。

2007年10月10日

序

22年前,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在复旦大学主办的“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①的报告,他指出:

姑以“中国文化”专指汉族文化,汉族文化几千年来是在不断演变中的,各个不同时代各有其不同体貌,也不能认为古往今来或整个封建时代一成不变。中国文化各有其具体的时代性,不能不问时代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

姑以“中国文化”专指中原王朝境内的文化,任何王朝都存在着好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各区文化不仅有差别,有时甚至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整个王朝疆域看成是一个相同的文化区。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

正因为如此,无论我们研究哪一种文化或亚文化,都必须和时间上、空间上作出限制,不能笼统地泛指某种文化。同样,如果我们要完整地、全面地认识某种文化的话,就必须充分注意到这种文化从形成以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变化,也即它的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这正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课题——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文化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

从理论上说,文化地理应该研究所有的文化要素,包括在“文化”这个概念下的全部内容。即使按照狭义的文化,或将文化集中

① 原载《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收入《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精神领域,也包括很多分支。即使在资料非常丰富的今天,要做到巨细靡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尽管我们知道当时的确存在某种文化现象,却无法进行复原和研究。所以研究历史上的文化,往往只能选择其中若干主要的、有代表性的要素。由于受到原始资料的制约,在选择这些要素时,不仅要考虑必要性,还必须顾及可行性,即是否能搜集到最低限度的资料。

所以,更深入的研究还得从具体的文化分支做起,或者集中于某种文化类型、某一文化要素。这类研究与对文化地理的整体研究的关系,就像专门史与通史的关系一样。要是没有专门史研究的基础,是写不出一部像样的通史的;但要是缺乏对相关阶段通史的理解,专门史的研究也难以具有理论深度和全局观念。

有鉴于此,夏增民选择了历史学术地理作为研究的方向,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儒学传播与汉晋南朝文化变迁》一书。但这项研究又不局限于历史学术地理,如果说儒学传播主要是儒学这种文化类型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空间分布的变化,那么文化变迁更强调在这一时间范围内不同时间之间的差别。关于这一点,先师在为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经指出:“文化地理学研究,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文化现象本身上,还必须与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和自然地理密切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一份正确的历史时期的政区地理,就无法确切地进行文化要素的区域统计,更无法制出文化分布图来。同样,如不了解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类型,对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兴衰变迁也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历史地理学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密切关联的系统,只有对历史时期各类地理要素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才有可能科学地揭示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此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成果与方法,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①读过本书的“引言”就能感到,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已经自觉地遵循了

①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序》,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先师的教导,充分运用了多视野、多学科的研究手段,因而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先师将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称为“国内第一部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专著”,是一项“创造性工作”,同时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投身于这一领域,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原到边疆,把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文化面貌理清楚,把文化区域的历史变迁搞明白,这样,科学的历史文化地理学一定能建立起来”。^① 可以告慰先师的是,包括本书在内的不少专著、论文的发表已经大大丰富了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就内容和阶段而言,本书与《汉晋文化地理》不无重合,但就儒学传播的研究而言,无疑比卢书更加深入具体,反映了学术的进步,自然也是对卢书开创之功的发扬光大。

本书的研究没有包括北朝,我想无非是三方面的原因:限于作者的时间、史料不足、儒学传播对北朝文化变迁的影响较小。但对一个历史阶段同时存在的空间范围来说,这总是一个缺陷,但愿在不久的将来能得到弥补。

葛剑雄

2008年2月

^①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序》,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摘 要

自西汉武帝时实行“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学即与政治结合,通过官学和私学传授的教育体系,诏书和法律的公布、流传,政府遣员循行地方,政府对儒学价值的标榜等渠道,加速在社会中的传播。西汉中期以后的汉代诸帝大多受过较好的儒学教育,他们推动了政府对儒学的提倡,也促进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儒学化。这一时期,儒学以两个向度即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从若干个中心向更广区域传播,引起东汉社会儒学的同质化,在儒学广布的地区,其价值逐渐成为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从此,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价值观基本定型。自汉末以至隋代,中国长期处于战乱和分裂之中,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化,改变了中国的思想格局。不过,儒学独尊的地位虽然受到冲击,但仍为政府所提倡,每朝代兴,无不整顿儒政,巩固并提高儒学的地位。三国两晋时期,中原地区屡遭兵燹,当地居民纷纷外迁,从而为儒学向四周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在南方地区。由于中原王朝政权和北方士民的南迁,在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持续发展,儒士人数不断增长,逐渐形成了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的建康吴会地区、鄱阳湖流域及周边的寻阳豫章地区和洞庭湖流域及周边的江陵江夏长沙地区三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出现了建康、会稽、吴郡、寻阳、南郡、江夏、长沙等一些儒家文化中心。这三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的形成,与那个时期的移民规模和路线、南北分治格局下东晋南朝荆州扬州之间特殊的政治形势以及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东晋南朝儒学在这三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的基础上,沿着陆路和水路(海路)继续向南、向西扩散,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南海交趾儒家文化区的成长,也推动了今福建地区的建宁晋安地区儒家文化的发展。在儒学化官员亦即所谓“循吏”和广大儒士的努力下,由于儒学的政治

文化功能,在儒家文化区域扩展的同时,风教所及,儒家的文化、精神价值也传布民间。儒学的南传,引起了当地文化的变迁,南方土著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崛起,并走上历史舞台;而广大南方土著居民也在文化上认同了汉族,归属到汉文化圈内,汉民族的“文化边疆”大大南移。隋代统一中国的再造,也正是儒家文化在广阔地域上传播后的内在诉求。

目 录

引言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关于历史学术地理	(6)
三、基本思路	(16)
四、研究方法和资料	(20)
第一章 儒学传播与汉代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22)
第一节 汉代皇帝的儒学教育及政府对儒学的提倡	(24)
一、西汉诸帝及宗室的儒学教育	(25)
二、王莽与儒学传播	(35)
三、东汉诸帝的儒学教育及对经学的贡献	(50)
第二节 两汉时期儒学传播的渠道	(53)
一、完整儒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与选官的儒学标准	(53)
二、采风、循行制度与儒学传布	(59)
三、诏书与儒学传播	(66)
第三节 上层社会阶层的儒学化与儒学传播	(76)
一、西汉官员群体儒学化与儒学传播	(77)
二、东汉官员及儒士群体与儒学传播	(82)
三、儒家文化区域的扩展与儒学价值观在东汉社会的确立	(89)
第二章 三国西晋时期儒学地位的升降与传播	(94)
第一节 曹魏西晋儒学地位的升降	(94)
一、曹魏西晋之儒政	(94)
二、曹魏西晋儒学发展之原因	(106)

第二节	曹魏时期的儒学传播与分布格局·····	(113)
第三节	蜀汉儒学的短暂生机·····	(129)
第四节	吴国儒学的继续发展·····	(140)
第五节	西晋儒家文化区域的分布态势·····	(145)
第三章	东晋南朝的儒政与儒家文化区的分布·····	(157)
第一节	东晋南朝之儒政·····	(157)
一、东晋之儒政	·····	(157)
二、南朝皇室之儒学教育与文化素养	·····	(163)
三、南朝政府对儒学教育之提倡与措施	·····	(170)
四、东晋南朝学官之建制	·····	(189)
第二节	东晋南朝儒士之分布·····	(195)
一、对东晋及南朝儒士资料的说明	·····	(195)
二、东晋南朝儒士籍贯分布	·····	(196)
三、东晋南朝儒士活动区域分布	·····	(214)
第四章	儒学的政治文化功能与东晋南朝的文化变迁·····	(235)
第一节	儒学的政治文化功能·····	(235)
一、儒学的政治功能及其制度化	·····	(238)
二、儒学的文化功能及儒家文化价值的播布	·····	(242)
第二节	南朝境内的文化变迁与汉民族“文化边疆” 的扩展·····	(256)
结语	·····	(270)
附录	·····	(276)
附录 A	东汉官员儒学教育资料	(276)
附录 B	曹魏博士考	(278)
附录 C	三国西晋循吏分布	(280)
附录 D	蜀汉儒士资料	(294)
附录 E	吴国儒士资料	(300)
附录 F	吴国经学著作	(305)
附录 G	西晋儒士考	(306)

附录 H 三国西晋儒学传授地分布	(317)
附录 I 东晋儒士资料	(321)
附录 J 南朝儒士资料	(335)
附录 K 东晋南朝循吏资料	(357)
附录 L 西晋和南朝四代儒士活动区域分布图	(379)
参考文献	(384)
后记	(403)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载体和研究对象。进入 20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儒学开始转换为现代学术形态。但由于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儒学的地位几起几落,儒学的研究屡兴屡衰,至 20 世纪 80 年代,儒学才又受到提倡,儒学的研究也开始升温。20 余年来,儒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① 总体看来,大致有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历史的研究,把儒学看成为是一门“知识”,剖析其思想的

^①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尤其是在世纪之交,伴随着儒学研究热情的高涨,学界一直在对儒学的研究过程进行回顾和反思,笔者对儒学研究内容的总结,即是据此进行,主要有 Th. H. 康(著),衣俊卿(译):《西方儒学研究文献的回顾与展望》(《国外社会科学》1990 年第 10 期);赵吉惠:《建国以来儒学研究的艰难历程与最新进展》(《唐都学刊》1992 年第 3 期);张海晏:《近年儒学研究的热点及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 年第 7 期);[韩]金德均:《最近韩国的儒学研究动向与方法》(《东岳论丛》1998 年第 3 期);郑家栋:《九十年代儒学发展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孔子研究》1999 年第 1 期);蒙培元:《开辟儒学研究的新境界》(《孔子研究》1999 年第 3 期);彭国翔:《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 21 世纪的儒学》(《孔子研究》2000 年第 3 期);傅永聚、韩忠文:《20 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中华书局,2003 年版);宋洪兵:《解读当前儒学研究新动向》(《史学理论研究》2004 年第 2 期);张亚宁:《1996—2004 年中国大陆儒学研究的新进展》(《孔子研究》2005 年第 2 期);陈卫平:《从重新评价到互动对话——台湾对大陆近 20 年儒学研究的评价》(《孔子研究》2005 年第 4 期);陈居渊:《20 世纪中国经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华文化论坛》2006 年第 4 期);于霞:《近 10 年来儒学当代价值研究简述与思考》(《学术研究》2006 年第 9 期)等。

发生发展,在历史的情境中“复原”儒学,展示其本来面目;二是哲学的研究,接续儒学的“三期”或“四期”发展,开创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新儒学”;三是价值的研究,视儒学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对儒学思想进行意义的探寻,发掘其当代价值,如儒学与人文精神,儒学与民族主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学与民主、自由和人权,儒学与全球化,儒学与世界和平,儒学与普世伦理及儒学与生态伦理等。而儒学传播的研究,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傅永聚、韩忠文在其主编的《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一书中,在总结20世纪儒学研究成果时,依照现代学科分类,把儒学研究分成21个研究专题,其中专门创制了儒学传播研究专题,即第21卷——《儒学传播研究卷》,全面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儒学传播研究的概况,汇集了这一时期该领域的代表作,毕显资料之功。另外,以笔者目力所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门以儒学传播为题的专著和资料汇编有5本^①(其中一本为通俗读物,与学术研究无涉),学术论文近百篇。从整体上看,儒学传播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但与儒学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则略显单薄。而且,儒学传播研究存在着畸轻畸重的现象,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分析(主要依据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和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发现儒学传播研究的主要研究范围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儒学国际传播,目前关于儒学传播研究的5本专著中的4本属于这个研究方向。2004年12月初,中国人民大学还专门举

^① 即张立伟:《心有灵犀——儒学传播谋略与现代沟通》(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朱仁夫、邱绍雄:《儒学走向世界文献索引》(齐鲁书社,2003年版)和《儒学国际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姜林祥:《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齐鲁书社,2004年版),张立文:《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办了“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① 儒学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是儒学传播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其次是欧洲。儒学传播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研究,一般比较关注其在该地区的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所依据材料大多是中国史籍,也有一部分是流布当地的汉籍和该国本土史料,如日本的《日本书纪》、《古事记》和朝鲜(韩国)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其中有些史料还是以汉文记载的。传播欧洲的研究的关注点一般在儒家经典的译介方面,传统上多属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范围,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几乎没有。东亚和东南亚同属“儒家文化圈”,因此对儒学传播东亚、东南亚的社会影响、文化意义等方面的研究要远多于儒学传播欧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儒学国际传播研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憾,即很多研究成果仅局限于一般性的概述和记叙,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②

其二,儒学经典文本的流传和儒学学派的传授谱系。这是最

① 方良,罗本琦:《“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2005年第4期,第67-69页。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即张立文:《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主要成果有伊文成:《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李洪淳:《儒家学说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的比较》(《延边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蓝仁哲:《〈易经〉在欧洲的传播》(《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张敏:《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何玉庭:《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东南亚纵横》1993年第2期);周发祥:《〈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关松林:《简论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徐远和:《“礼”在日本的传播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7期);林玄:《传播和影响:儒学在日本》(《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谢建明:《儒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及其整合》(《东南学术》1996年第2期);张亚群:《儒家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演化及其前景展望》(《华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张西平:《〈易经〉在西方早期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4期)等。